

生态适应中乡村地方性景观的分化重构与机制分析

Differenti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Rural Local Landscape in Ecological Adaptation

汪芳
章佳茵
卞辰龙
王舜奕

WANG Fang
ZHANG Jiayin
BIAN Chenlong
WANG Shunyi

摘要: 乡村地方性景观在复杂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呈现着动态的生态适应与分化重构, 揭示其重构机制是乡村多元特色保护和宜居化发展的基础。以受生态约束的兰考县典型乡村为例, 梳理了生态适应视角下, 兰考乡村地方性景观在县域集中性生态治理与适应、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与重构2个阶段的行动者网络过程, 分析了伴随着乡村土地利用结构、建筑分布格局、院落空间形态等景观特征演化; 并对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机制进行了剖析, 发现生态约束的程度变化主导着景观重构的阶段演替, 且生态适应路径差异化变迁推动乡村景观分化为原生型、拼贴型和迁移型等地方性类型, 为乡村的多元定位与转型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风景园林; 生态适应; 地方性; 乡村重构; 景观演化; 兰考县

文章编号: 1000-6664(2023)04-0014-06

DOI: 10.19775/j.cl.2023.04.0014

中图分类号: TU 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2-11-14

修回日期: 2023-03-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宜居城乡地方性景观生态规划理论及方法”(编号5213080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地协调与城乡协同的乡村规划建设研究”(编号21AZD033)共同资助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plex natural environment, rural local landscape presents dynamic ecological adapt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revealing its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is the basis of rural multi-characteristic protection and livable development. Taking the typical villages of Lankao County under ecological constraint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actor network process of Lankao rural local landscape in two stages of intensive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adapt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ocal landsca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daptation, and analyzed the accompanying evolution of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ural land use structure, building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courtyard spatial form. The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rural local landscape different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found that the change of ecological constraints dominated the stage succession of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adaptation paths promot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landscape into local types such as native type, collage type and migration type, which provided the basis for rural multiple positioning and transformation governance.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ical adaptation; locality; rural reconstruction; landscape evolution; Lankao County

乡村是人居环境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长期的环境选择形成地方性鲜明的乡村景观^[1]。地方性强调内部潜在、积极的互动实践^[2], 通过乡村景观结构的演化可以反映出各主体与景观的互动模式。因而, 乡村地方性景观是指特定乡村地域中, 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地表景象, 包括人居环境所必需的空间范畴及物质要素^[3]。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 乡村地方性景观面临着生物多样性降低^[4]、植被生产力下降^[5]、地表水质退化^[6]等生态劣质化现象, 也在动态变化过程中表现出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耦合适应^[7]。生态适应是人地系统应对动态变化环境做出的自我调整与反馈^[8], 以可持续的方式调整系统以实现动态平衡, 成为应对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

生态适应的过程中, 乡村地方性景观在人与环境的渐进作用下不断发生重构^[9], 体现在土地利用、建筑街巷等乡村物质空间中。当前, 生态适应背景下乡村聚落的研究主要涉及3个方面: 乡村地方性景观的适应性类型及演化规律^[10]; 生态适应机制和影响因素^[11]; 典型区域环境系统中乡村聚落景观的适应性演变^[12]。在特定区域系统中承担了更多生态保育角色的乡村, 需要从地方性景观重构视角, 探索生态系统与其他要素的协调。与此同时, 在复杂外部因素的影响下, 乡村空间的多样化和异质化重构日益明显^[13], 不同乡村景观的生态适应方式表现出对象复杂、主体多样及路径多元的特点^[14]。厘清乡村地方性景观的分化重构过程与内外动力机制, 对发掘乡村景观多样化、针

对性治理的科学途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景观作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对象之一^[15], 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乡村地方性景观的分化重构不仅体现在乡村景观物质空间形态的重新组织, 也体现在背后的多主体参与和互动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从系统视角, 将人类和非人类因素视为平等的行动者, 通过关注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 解读系统的内部互动关系, 将微观行为与宏观结构相结合, 以对宏观变化的过程和动力机制进行解释^[16-17], 逐渐被应用于乡村发展模式与转型重构的研究中^[18-19]。乡村景观是自然、人类和许多其他现象的网络集合, 理论上应赋予自然元素与人类行动者同等的地位^[20-21]。因而, 这一过程中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行

动者网络是根植于地方的多要素交织模式。行动者网络打破了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元对立,强调内外部要素的关联和同等重视,有利于深度剖析生态适应中异质行动者在不同阶段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由此推动的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结果。

结合自然基底与社会人文关系来理解乡村景观空间演化与重构,是地方性景观研究的重要视角。同时,对于指导不同类型的乡村转型发展、促进提高乡村的宜居性与可持续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通过行动者网络的分析框架,以河南兰考的典型村落为例,分析以下方面:1)在生态环境的约束下,乡村地方性景观呈现出怎样的演化阶段?2)随着生态要素的变化及其在不同村庄的不同表现,乡村地方性景观经历怎样的分化重构过程与阶段性结果?3)乡村地方性景观在生态适应过程中发生分化重构的驱动机制是什么?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分析框架

在地方性景观的演化过程中,景观适应的路径逐渐分化成原生型地方性和建构型地方性^[22]。原生型地方性大多体现着景观原来的特征;建构型地方性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多,呈现地方性要素的流动。体现在乡村的地方性景观重构中,部分村落长期保持与生态本底适应的农业生产活动^[23],表现着原生型地方性的特征。而在生态适应的背景下,建构型地方性又可分为主动适应和被动适应2种形态。在生态适应进入稳定阶段的地区,相关主体主动依托当地生态要素,植入新的元素以带动村庄发展,并实现与原有场地融合^[24],改变乡村风貌和社会网络,可理解作为一种拼贴型的地方性;在持续面临生态灾害的地区,人们被动通过易地搬迁规避生态劣化,形成农民集中安置导向下的移民新村^[25],重塑新搬迁节点的空间环境和功能,产生了迁移型的地方性景观。由此,构建乡村地方性景观的类型分化分析框架,对兰考县的乡村地方性景观进行类型分解。

在生态适应的背景下,乡村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可转换为行动者网络中具有能动性的非人类和人类的异质行动者。异质行动者面临着由各自利益驱动的不同目标和障碍,并根据其中核心行动者的目标和方向通过强制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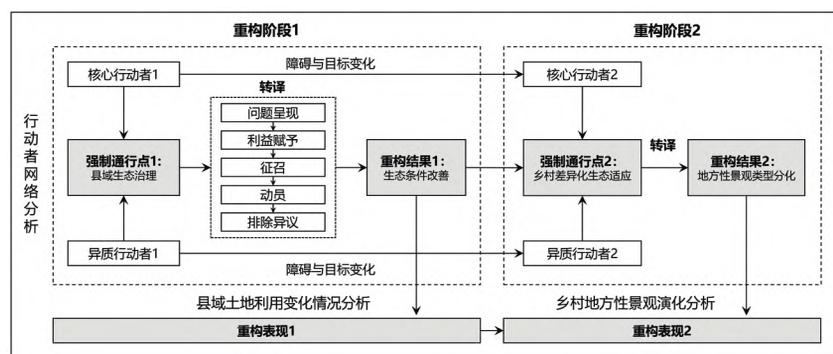


图1 地方性景观重构过程与表现分析框架

行点,互相嵌入动态的转译过程,形成重构结果。转译过程需要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及排除异议5个阶段^[26]实现,即核心行动者聚焦关键问题形成所有异质行动者实现目标的强制通行点^[27],通过各种策略将利益赋予其他行动者,将其征召和动员结成网络联盟,并需要排除转译过程中偏离网络的异议,维护网络的稳定运行^[28]。随着研究对象的障碍与目标发生变化,行动者网络进一步发生重构,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转译过程。通过行动者网络的形成与转译框架,乡村地方性景观的重构过程可以得到清晰的呈现。因此,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研究框架(图1),对乡村地方性景观的分化重构过程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县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乡村地方性景观演化分析等方法研究乡村地方性景观的重构表现。

1.2 案例地概况

兰考县位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部,地形地貌受黄河影响较大,其乡村地方性景观具有多元化的重组现象。黄河自金代流经县境以来,多次决溢迁徙,使得县内遭受风沙、盐碱、内涝等灾害威胁。在生态环境的约束下,县域自1960年以来采取多种生态治理措施,当地乡村的地方性景观也不断地进行自我干预与调整,产生了不同的适应类型。其中,杜寨村、谢庄村地处黄河故道,村庄适应过程以传统农业为基础,发展适应自然本底和生产条件的农业,其乡村景观依然为原生型地方性;范场村、张庄村为生态要素驱动的旅游型村庄,利用生态治理时期形成特色林业,引入旅游等特色产业,并通过景观改造活化村庄内部功能,其乡村景观分化重构为拼贴型地方性;东坝头村、姚寨村位于黄河低滩区,通过易地迁建,重塑村庄的景观与空间结构,其乡村景观分化重构为迁移型地方性(图2)。

1.3 研究数据与方法

1.3.1 县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

为分析县域集中性生态治理结果与适应过程,利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提供的30m分辨率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1980、2000和2020年),构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每一时期内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6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演变方向和程度,呈现兰考县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化过程。

1.3.2 乡村地方性景观演化分析

为分析不同类型乡村地方性景观的演化过程,根据2009和2021年分辨率为0.5m的Google Earth高清影像及各乡镇政府提供的村庄行政边界资料,目视判读及解译兰考县典型乡村的用地结构和建筑分布,分析乡村的土地与建筑格局变化情况;根据实地调研观察和照片拍摄情况,分析乡村的院落空间形态变化情况。

1.3.3 地方性景观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研究团队于2022年8月在兰考当地乡村对县政府干部、镇政府干部、村委会干部、本地村民、民宿及乐器产业从业人员、外来游客等28个相关对象进行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长约为30min~1.5h,访谈重点包括乡村基础情况、产业情况、政策支持、乡村地方性景观变迁等;结合政府提供的地方志、乡村发展历程、乡村产业情况、乡村发展规划、乡村政策等相关文本资料,以及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获取的资料,系统梳理兰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

2 兰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

2.1 兰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60年以来的重构历程

兰考县自1960年前后进入集中性的生态治理过程,在县域较长时段的生态治理与适应下,

生态要素在不同村庄的制约情况逐渐降低并呈现出差异。尤其是进入2010年,在国家陆续出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及乡村振兴等乡村发展政策的宏观背景下,乡村聚落、土地资源、民居形态等乡村地方性空间景观出现了多元分化倾向^[29]。考察1960年以来生态适应与兰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发展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将兰考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分成2个阶段:1)县域集中性生态治理与适应(1960—2010年),在县政府的主导下,兰考县整体生态环境条件逐步改善,为乡村进一步发展奠定生态基础;2)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与重构(2010年至今),在不同层次政府的主导下,兰考县乡村的地方性景观逐渐分化重构为原生型地方性、拼贴型地方性和迁移型地方性。阶段演替中,兰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如图3所示。

2.2 阶段一：县域1960—2010年的集中性生态治理与适应

1962年,围绕防治以风沙、盐碱、内涝“三害”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强制通行点,兰考县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征召动员群众开展以深翻土地、引黄灌淤为核心的生态治理工程,探索出规模化种植泡桐、刺槐等抗风沙树种的策略。1980年前后,逐渐转向稳定的生态适应阶段。根据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计算结果,生态条件改善的重构结果在县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用地结构变化(图4),为乡村发展奠定了生态基础。1980—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主要体现在耕地转化成林地和建设用地,部分草地、水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转化为耕地。2000年至今的土地利用转移变化主要表现在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上,耕地较多转移成建设用地和水域。总体而言,1980年至今,兰考县耕地较多转移成林地和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主要转移成耕地。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生活生产需求进一步增强,耕地集约化,建设用地持续扩张。兰考县森林覆盖率增加,大面积盐碱地基本消失,其景观格局演化过程反映着生态治理的显著成效。

2.3 阶段二：乡村地方性景观2010年以来的生态适应与分化

2010年前后,兰考县乡村生态适应发生阶段演替,其行动者网络进一步重构,强制通行点从共性的“三害”治理转向差异化的生态适应,以应对不同村庄的发展需求。乡村地方性景观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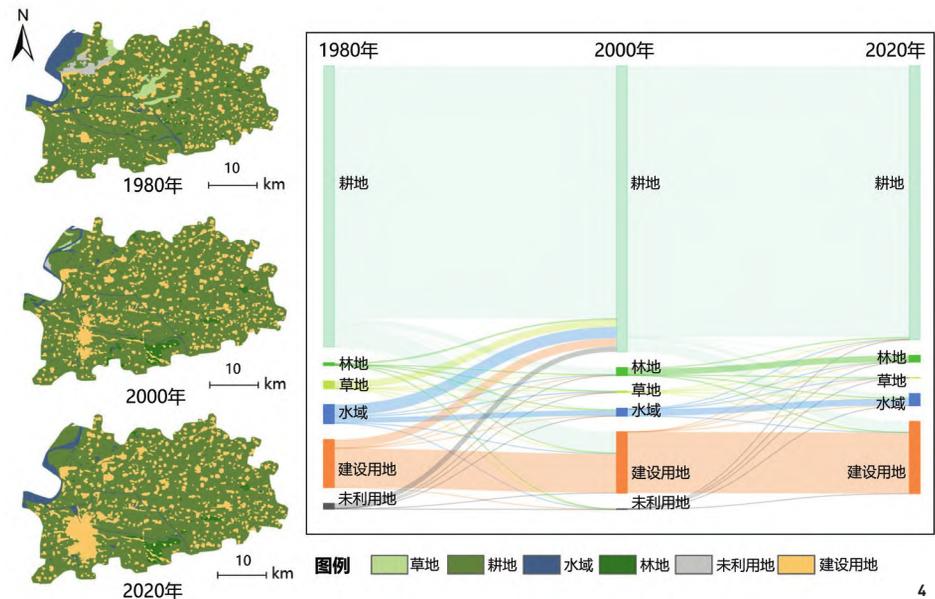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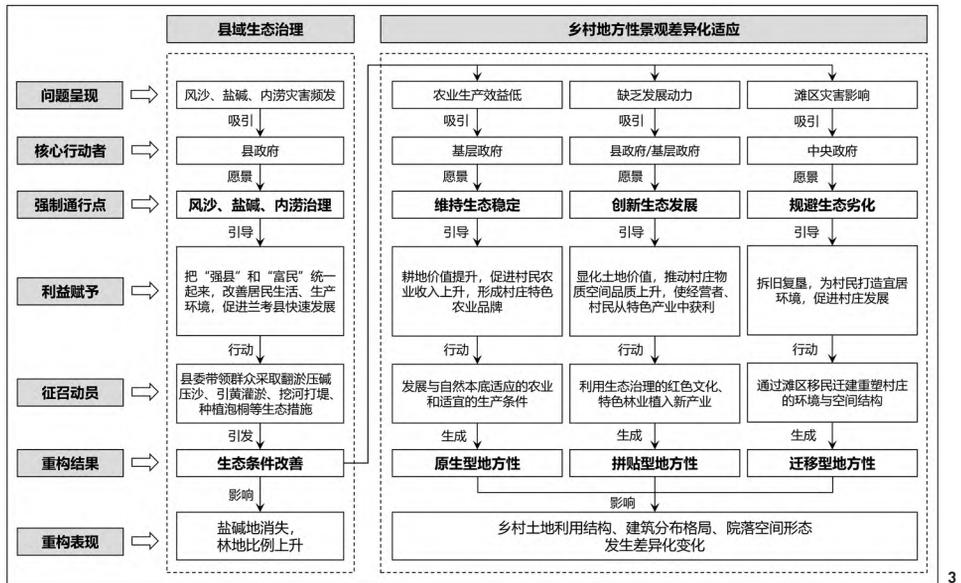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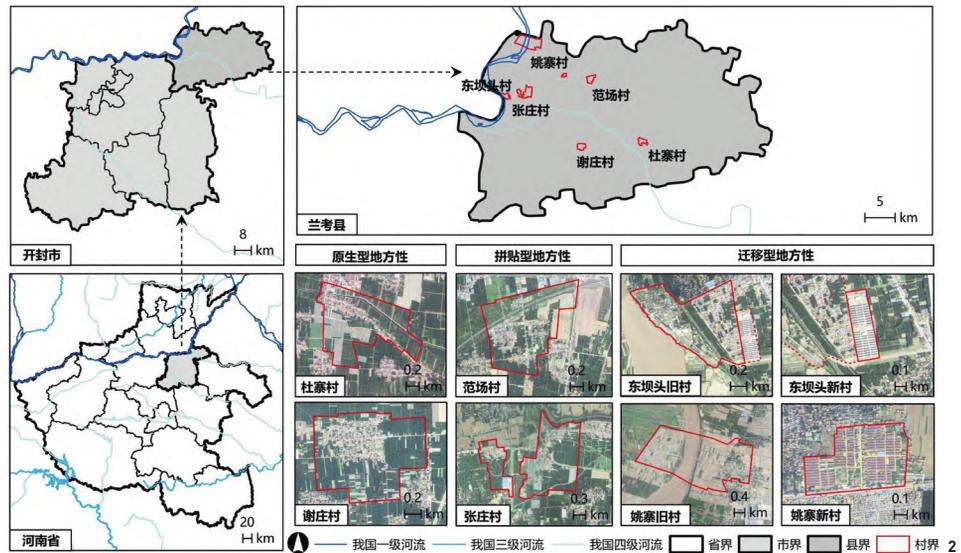


图2 案例地区位图
图3 兰考县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
图4 兰考县1980年以来土地利用的分布及转移情况

型向原生型地方性、拼贴型地方性和迁移型地方性的“一区多类”演化,并伴随着乡村土地利用结构、建筑分布格局、院落空间形态等差异化的景观演化过程(图5-7)。

2.3.1 原生型地方性

原生型地方性景观以杜寨村、谢庄村为代表。兰考属平原农区,农业垦殖较早,因黄河长期多次改道泛滥,农业在生态约束下产量低而不稳。县域生态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后,风沙、盐碱、内涝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低,但仍缺乏稳定的生态种植环境,由此行动者网络发生二次转译。在问题呈现阶段,基层政府困于农业生产效益不高,进而农村发展资金不足,人居环境难以改善;村民因自然条件不稳定、设施落后、生产知识匮乏而持有较低的农业收入,生活水平较低;耕地资源为弱碱性,不适宜种植庄稼,缺乏能匹配资源价值的有效利用;其他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缺乏合理改造与优化利用。作为谋求村内发展思路的主体,村委成为核心行动者。以维持生态稳定为强制通行点,在利益赋予阶段,村委通过耕地价值提升、村民农业收入上升、形成村庄特色农业品牌等目标,引导其他行动者成为网络的联盟成员,进而采用因地制宜的种植方式并人工创造生产环境。沙性土壤适宜蜜瓜、西瓜等瓜类作物的生长,在征召动员阶段,通过土地流转整合村内耕地统一管理,引入温室大棚,人为创造适宜的生产条件。在此基础上,村委动员群众参与西瓜、蜜瓜种植,并优先聘用贫困户劳动力在种植区务工,以带动本村贫困户及弱势群体就业,利益进一步被赋予村民,并排除村民不愿流转土地的异议,两村的农业发展也产生品牌效应。

在农业发展的主导下,杜寨村、谢庄村分化为原生型地方性,其地方性景观仍以农田为主,耕地中大棚数量不断增长,但土地利用结构和建筑分布格局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图5、6)。同时,在农业效益提升的带动下,村庄进行环境整治,但注重传统住宅和文物建筑的保护。在杜寨村,村委进行道路拓宽时,不拆路南住房,以主房不动的原则拆除围墙,为居民加盖统一的门楼(图7)。而谢庄村虽受黄河多次泛滥改道影响,但仍在原址保留有谢家双楼这一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2.3.2 拼贴型地方性

拼贴型地方性景观以范场村、张庄村为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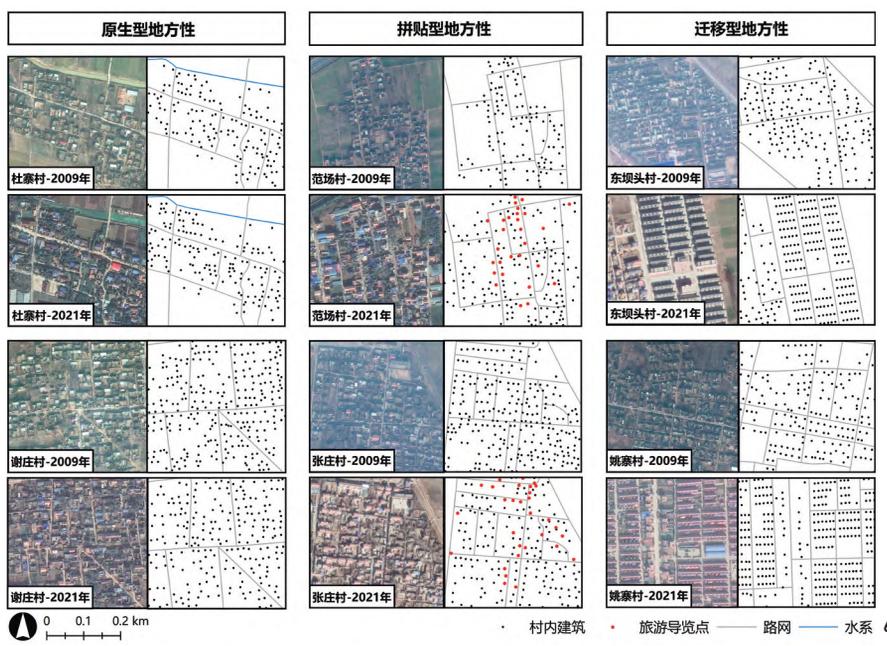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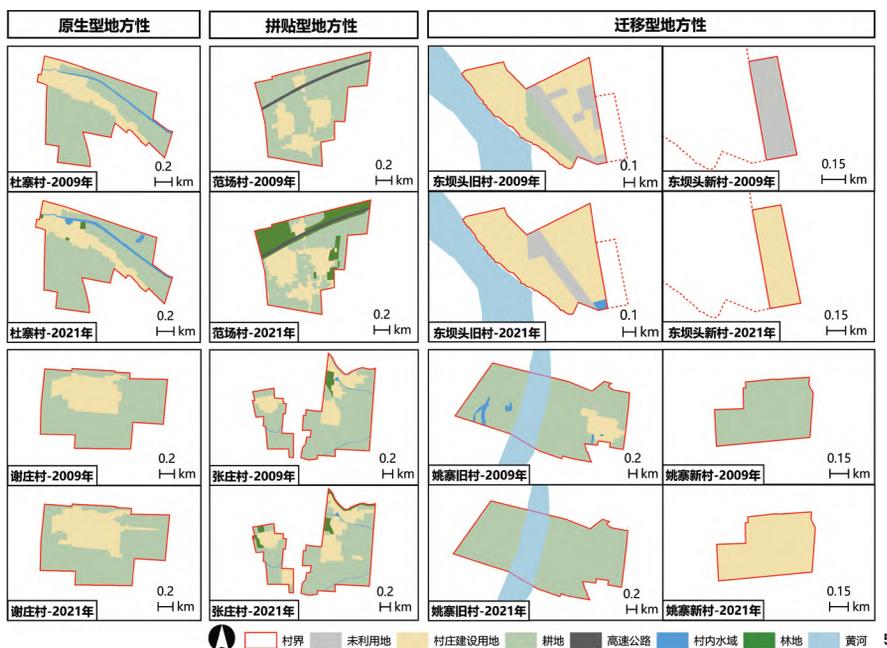


图5 兰考县典型乡村土地利用结构重构
图6 兰考县典型乡村建筑分布格局重构

表。兰考大量种植了防风固沙的树种,如范场村的泡桐林、张庄村的刺槐林,乡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也成为地方性景观演化的转折点,推动行动者网络二次转译。2010年前后,两村仍为贫困村,问题呈现为生态条件稳定但缺乏核心发展动力,出现新的强制通行点,需要寻求生态化的创新发展路径。范场村种植的泡桐是制作民族乐器的最佳材料,县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以民族乐器生产为切入点,在兰考县村镇体系规划中明确“埙阳音乐小镇”“中国民族乐器村”等规划目标,以基层政府代为执行,主导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过程。在利益赋予阶段,政府以范场村

中的自然村之一徐场村为示范,带动周边乡村发展。征召动员阶段,政府带动村民利用泡桐树生产乐器,开设制作民族乐器的家庭作坊,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为作坊打工,请专家融合乐器元素对村内景观进行统一改造,接待民乐相关从业者、机关事业单位及游客等入村参观,并与音乐类高校签约作为实践基地,吸引了外出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而张庄村的刺槐林则因生态治理的历史文化成为红色旅游景点。2015年,县委干部调研发现村内较多的闲置房屋,村委通过租金租赁的方式将利益赋予村民及住宅、闲置用地和特色林业等其他非人类行动者以发展乡村旅游。在征

号召员阶段,县政府组织乡建专家、旅游公司和村民对生态资源、闲置用地、闲置农户院落等进行设计改造,建成“梦里张庄”旅游景区。

通过生态要素的征召和有效利用,地方性景观植入新元素并分化为拼贴型地方性。相同的是,两村部分耕地发展为林地(图5),以村内中心大街为轴线设置旅游景点(图6)。在范场村的景观改造过程中,利用废弃空地和旧砖瓦按照古乐音阶修建游园,在街道融入乐器元素。家庭作坊内院落结构发生变化,乐器经营者在一楼设置展示区、茶室、制作车间等,二楼为生活空间,实现了在垂直空间上的混合利用(图7)。张庄村在保留传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利用当地材料进行装饰,更新建筑内部功能,打通院墙,植入张庄戏院、黄河湾书画院、民俗馆等文旅场所,活化空心院落,部分民居被改造成民宿。

2.3.3 迁移型地方性

迁移型地方性景观以东坝头村、姚寨村为代表。黄河滩区既是黄河行洪、滞洪、沉沙的场所,也是区内居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问题呈现阶段,在县域集中性生态治理的前提下,滩区村庄因行洪河道的特殊地理位置,伴随汛期洪水淹没的安全隐患,村民基本生活缺乏保障,异地迁建成为解决滩区问题的民生工程。由此,中央政府成为二次重构的核心行动者,围绕规避生态劣化的强制通行点,于2014年在兰考陆续开展移民迁建试点,东坝头村、姚寨村是其中的试点村。在利益赋予和征召动员过程中,中央政府以政策下达的形式首先把省政府、地方政府、黄河河务部门等政府部门征召到移民迁建的行动者网络中,并将首要利益赋予村民。在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整合部门项目资金、群众自筹和节余建设用地指标筹资等渠道筹措迁建资金的征召下,村民住宅、滩区耕地、未利用地等非人类行动者也被动员到网络中,使移民村发生地方性景观和土地利用重构(图5)。临近黄河的耕地或建设用地进行拆旧复垦,土地流转至村集体,而村庄建设用地迁至镇政府附近的未利用地或闲置耕地。在生态移民的行动者网络中,旧村村民也会因地方依恋与宏观政策产生异议,需要核心行动者排除异议。与整体搬迁的姚寨村相比,东坝头村仍有部分村民居住在地势较高的老村,利用荒废的房屋养殖牲畜。

滩区生态移民迁建推动了东坝头村、姚寨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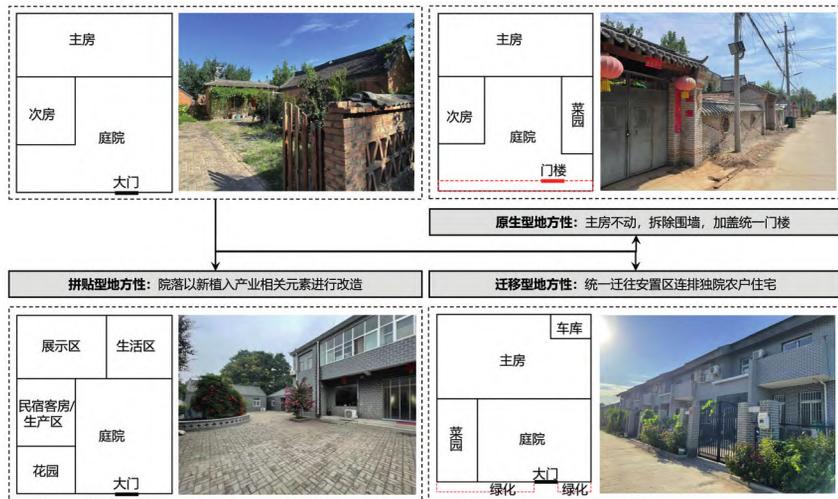


图7 兰考县典型乡村院落空间形态重构

的地方性景观重构为迁移型地方性。搬迁的居民按照家庭人口数分配面积不等的连排独院,经过统一规划,移民新村的建筑分布排列规整,院落结构统一,用地更加集约化并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图6、7)。新村普遍没有耕地,但村民在庭院空地种植蔬果等生产农业景观,对移民新村进行自发式、适应性的空间实践,体现着地方性生活方式和耕作习惯的迁移。

3 生态适应中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机制分析

3.1 生态约束程度变化主导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的阶段演替

伴随着兰考县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约束程度发生变化,乡村面临的问题由外部环境约束逐渐转化为内生性动力不足。核心行动者由县政府更替为基层政府、中央政府等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强制通行点由“集中式生态治理”转向“差异化生态适应”,决定了乡村地方性景观的阶段演替。在此过程中,行动者组成发生变化,相同的行动者因作用方式、参与程度等发生变化而产生身份转换,使行动者网络发生二次重构。乡村精英、村委通过吸引外来投资、引进农业生产技术、邀请设计师改造院落等方式,日渐成为行动者网络中的重要力量。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各方行动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治、移民搬迁等工程,从而追求更高的人居环境品质。

3.2 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共同塑造乡村地方性景观演化特征

以往的研究着眼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非人类因素在景观重构中的角色被忽视。生态适应背

景下,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中的非人类行动者处于重要地位,如黄河滩区地貌、土壤条件、特色树种,地方性景观在核心行动者的带领下围绕这些自然要素发生重构。而人文因素,如政策、社会因素等进一步对其产生影响。国家陆续出台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战略与措施,促进村域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及村貌整治。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和脱贫攻坚的背景下,兰考县推行“一宅变四园”“四好公路”“沿黄生态廊道”等民生工程,并借助移民工程的政策机遇,高效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近年来,“增减挂钩”政策将闲置用地转变成生产生活用地,地方性景观进一步重构。

3.3 生态适应路径差异化变迁推动乡村地方性景观类型分化

不同内外部因素介入打破了行动者网络原有的整体结构,如原生型村庄的农业生产技术介入、拼贴型村庄的产业与资本介入、迁移型村庄的政策介入,导致生态适应方式的差异化。在传统农业型村庄中,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流转土地规模种植适应自然本底的作物,引入种植技术及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尽量延续建筑的传统风貌,保持着原生型景观特征。在资源禀赋较好的村庄,利用地方性资源和物产,植入手工生产新技术、旅游经营等新产业,带动村庄转型;村委会带头利用闲置地塑造景观节点,展示乡村特色并丰富村民生活;生产经营扩大化导致部分居住空间转为生产车间,建设用地扩张,乡村空间集中生产、居住、娱乐功能,形成新旧交织的拼贴型地方性景观。在沿黄生态脆弱区,政府通

过自上而下的移民迁建工程重塑村庄空间结构与居住环境,原有宅基地被复垦为耕地,村民在新村自发式进行空间实践,将传统生活习惯迁移而来,并与新村建立情感联结,逐渐分化成迁移型地方性景观。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兰考县6个典型乡村为例,研究生态适应中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过程与机制,得出以下结论:1)兰考县的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重构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分为县域集中性生态治理与适应、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与重构2个阶段;2)县域集中性生态治理与适应阶段中,县政府以共性的生态灾害治理为目标,使兰考乡村整体的土地利用结构发生变化;3)在乡村地方性景观分化与重构的阶段中,乡村地方性景观类型分化为原生型地方性、拼贴型地方性和迁移型地方性,乡村土地利用结构、建筑分布格局、院落空间形态等乡村地方性空间景观出现对应的类型差异;4)核心行动者与强制通行点演替、不同外部因素介入等使乡村地方性景观出现重构的阶段演替和类型分化,其中自然要素功能凸显,与人文要素共同塑造了地方性景观的演化特征。

从研究层面来看,乡村地方性景观重构面临的社会转型因素繁多,主体作用机制复杂,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视角考察生态适应中各类要素的动态联系具有必要性。乡村地方性景观生产是多元主体互动协商下的持续、不稳定的过程,任何外部力量的介入皆有可能改变其发展轨迹^[30]。在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双轴驱动下,乡村地方性景观的演化需要以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视角,在多尺度系统开展不同区域层面、多元外部性环境下的中国乡村地方性景观的空间分化过程、动力机制和景观治理机制研究,还需进一步探讨不同尺度之间的联系互动。聚焦现实,不同地方性景观类型却体现出相同的宜居需求。未来,乡村有机会充分利用经济发展要素,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转向工业制造和旅游服务^[31],城乡之间双向人口流动有利于乡村劳动力素质提升,进而带动新一轮的乡村景观重构;新型土地经营模式如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发展日趋完善,以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推动乡村土地利用模式转变。在此背景下,乡村的景观治理需要按照不同

类型进行有序引导。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或拍摄。

参考文献:

- [1] 孟晓东, 张大玉. 北京川底下村乡土聚落边界景观形态解析[J]. 中国园林, 2016, 32(9): 11-15.
- [2] Cooke P. *Routledge Revivals: Localities (1989): The Changing Face of Urban Britai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10-11.
- [3] 王云才, 石忆邵, 陈田. 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与展望[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20(1): 18-24; 51.
- [4] Bradshaw C J A, Craigie I, Laurance W F. National emphasis on high-level protection reduces risk of biodiversity decline in tropical forest reserves[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5, 190: 115-122.
- [5] Isbell F, Craven D, Connolly J, et al. Biodiversity increases the resistance of ecosystem productivity to climate extremes[J]. *Nature*, 2015, 526(7574): 574-577.
- [6] Wichelns D. Volumetric water footprints, applied in a global context, do not provide insight regarding water scarcity or water quality degradation[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7, 74: 420-426.
- [7] 肖娟, 杨永清. 基于生态适应性理论的川东民居传统聚落景观分析[J]. 生态学报, 2017, 37(13): 4529-4537.
- [8] Holling C S.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J]. *Ecosystems*, 2001, 4(5): 390-405.
- [9] 屠爽爽, 龙花楼.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J]. 地理科学, 2020, 40(4): 509-517.
- [10] 张子琪, 袁知, 王竹. 基于类型学方法的传统乡村聚落演进机制及更新策略探索[J]. 建筑学报, 2017(S2): 7-12.
- [11] 孙应魁, 翟斌庆. 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的乡村聚居景观演化及影响机制: 以新疆村落的适应性循环为例[J]. 中国园林, 2020, 36(12): 83-88.
- [12] 文琦, 张亮, 朱琳, 等. 黄土高原乡村地域多功能演化与振兴路径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2, 44(6): 115-126.
- [13] 杨忍, 罗秀丽. 发展转型视域下的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研究进展及展望[J]. 热带地理, 2020, 40(4): 575-588.
- [14] Wang F, Prominski M. Landscapes with locality in urban or rural areas[J]. *Indoor and Built Environment*, 2020, 29(8): 1047-1052.
- [15] 德波. 景观社会[M]. 张新木,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4; 7; 13-24.
- [16]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Through Society*[M].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1-215.
- [17]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3-175.
- [18] 杨忍, 徐茜, 周敬东, 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蓬筒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J]. 地理科学, 2018, 38(11): 1817-1827.
- [19] 杨忍. 珠三角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J]. 地理学报, 2021, 76(12): 3076-3089.
- [20] Chen Z, Ren X, Zhang Z. Cultural heritage as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tik production amongst China's Miao popul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1: 182-193.

- [21] Rocheleau D. Rooted networks, webs of relation, and the power of situated science: Bringing the models back down to earth in Zambrana[M]// Harcourt W.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ender and Develop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213-231.
- [22] Wang F, He H, Dong Y, et al. Shaping or being shaped? Analysis of the locality of landscapes in China's farming-pastoral ecotone,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land use[J]. *Land Use Policy*, 2018, 74: 41-52.
- [23] 田健, 曾德平, 曾坚. 重构·重生·重现: 基于行动规划的传统乡村“微”振兴策略与实践探索[J].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1): 60-70.
- [24] 胡静. 旅游语境下的乡村重构[J]. 旅游学刊, 2018, 33(7): 1-3.
- [25] 胡西武, 刘小鹏, 黄越, 等.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测度及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0, 75(10): 2224-2240.
- [26] Callon M.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J].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32(S): 196-233.
- [27] 程叶青, 王婷, 黄政, 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的乡村转型发展机制与优化路径: 以海南中部山区大边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4): 34-43.
- [28] Law J, Bijker W. Postscript: Technology, stability and social theory[C]//Bijker W, Law J. *Shaping Technology, 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London: MIT Press, 1992: 76-78.
- [29] Woods M. 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sing rural ge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0, 34(6): 835-846.
- [30] 曾莉, 吕光耀, 安宁. 艺术介入背景下的乡村景观再生产研究[J]. 人文地理, 2022, 37(4): 53-64.
- [31] 屠爽爽, 郑瑜哈, 龙花楼, 等.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 以广西为例[J]. 地理学报, 2020, 75(2): 365-381.

(编辑/马琳)

作者简介:

汪芳

1973年生/女/湖南衡山人/博士/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流域地方性建成环境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联合主任/研究方向为建成环境地方性和适应性规划理论与方法(北京 100871)

章佳茵

1998年生/女/广东韶关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北京 100871)

卞辰龙

1997年生/男/江苏南通人/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规划(北京 100871)

王舜奕

1994年生/女/山东东营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遗产保护(北京 100871)